

目 录

前言

日机狂轰滥炸个旧概况	潘富国 萧茂榕 (1)
日寇的侵略战争对个旧锡业生产的破坏	王治安 (3)
日本侵略者轰炸个旧的罪行	苏学文 (9)
日机轰炸个旧对锡业生产的影响	牛俊秋 (12)
抗日战争时期的个旧《曙光日报》	舒 新 (14)
个旧南钟剧社抗日宣传活动	魏少堂 (24)
回忆个旧、建水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郭启芳 (28)
抗日战争回忆片断	徐 均口述 梁伟明整理 (35)
“远征军”卫生处及其他	姚梦梅供稿 梁伟明整理 (41)
在缅甸北部的一支抗日华侨游击队	周 明 (47)
川江运军粮	胡定华 (53)
入越受降	谢德驹 (55)
和日、伪军的几次激战	姚天才 (59)

回忆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的三次战斗

沈应洲口述 李家辉整理（67）

日本鬼子进攻我家乡 卫立云（74）

新四军敌后游击抗日的回忆 李东江（77）

大浦头战斗经过 康丙寅（80）

在日寇扫荡中和敌人周旋 乔 顺（82）

日军侵华暴行两则 李东江（85）

日机狂轰滥炸个旧概况

潘富国 萧茂榕

1938年至1941年这阶段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对个旧先后共炸了23次，首先是炸了锡业公司机关。23次轰炸中架数最多的一次有27架，最少的一次有3架，每次9架的情况比较多点。23次中破坏最惨重的一次是1938年12月22日，这天是冬至节。早上警报响后，市民都疏散了，直到5点钟不见动静。有部份市民以为到这时候不见来，恐怕不会来了，同时因贪回家过冬，便陆续回到市区家里。但是，不久突然飞来27架日机，开始了狂轰滥炸，正街和米店街之房屋大多数被烧毁，有的因抢搬物资亦被烧死。这是抗日战争中，个旧市民生命财产损失最严重的一次。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个旧被日寇飞机轰炸23次的地点叙述如下。因为事隔多年，确切时间记不起了，被炸之先后，除第一、二、三、四次及最末一次外，也记不准了。

第一次 云南锡务公司选厂，炼锡公司炼厂。

第二次 大桥孔庆朱和大吉祥之房子都被炸。

第三次 车站大街和荣禄街老电影院被炸。

第四次 锡矿工程处（俗称中央公司即胜利坑），有1枚炸弹没有爆破。

第五次 米店街（现五一路靠近大桥一段）和正街，时间1938年12月22日，日机27架。是损失最严重最大的一次。

第六次 个旧草桥分金炉之墙脚附近。

- 第七次 绿春花秦思才之房子炸毁。
- 第八次 老厂中央公司（即现在胜利坑）。
- 第九次 单边街（即今之中山路）。
- 第十次 大坟坝（即今州政府一带）。
- 第十一次 下河沟罗美家炉房（炸弹未爆炸）。
- 第十二次 云南锡业公司的机厂。
- 第十三次 李家花园（即现在人民剧院）。
- 第十四次 正街（即现在药材公司门口至大桥）。
- 第十五次 个旧铁路公司墙脚附近。
- 第十六次 个旧老县政府（即今之劳动局所在地）大门口。
- 第十七次 人民路（现人民路水果门市对面）罗丹封之房子被炸毁。
- 第十八次 下河沟（原老机关招待所）杨家和之炉房，落在门口未爆炸。
- 第十九次 张瑞臣之信义市场（今中医院对门）落在门口。
- 第二十次 马成炉房（今市机关幼儿园）亦被炸毁。
- 第二十一次 炸米店街去瓦房冲之路口。
- 第二十二次 云锡公司个旧选厂。
- 第二十三次 个旧老厂。此次共来9架，内有一架才到秧草塘就起火，飞到白牛洞后雷打山脚爆炸坠落，烧毁飞机零件。事后由老厂运来个旧大坟坝给群众参观。由此以后，就没有来过。

印象虽深，怎奈年代久远，不一定点点滴滴正确，读者纠正补充。

日寇的侵略战争对个旧 锡业生产的破坏

王治安 收集整理

解放前个旧厂尖之发展，最繁荣的时期要算抗日战争开始前的几年和开始后两年，矿工达十万余人。据个旧厂业同业公会一九三四年九月调查，个旧之厂尖数，包括黄茅山区、耗子厂区、花扎口区、蒙子庙区、松树脚（古山）区、新厂（马拉格）、独立甲、牛屎坡等地（俗称四十八厂）共有洞尖、草皮尖、买荒尖四千一百八十户，其中洞尖二千七百户，占百分之六十四点四，草皮尖九百三十户，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二，买荒尖五百五十户，占百分之十三点二。大小厂尖星罗棋布。尽管那时矿区工人遭受着严重的封建主义压迫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人身毫无保障，但是每天上下厂之人，为矿区运送生产、生活物资的骡马，络绎不绝。矿山上工头的叫骂声，工人的叫喊声、说话声，有时工人发出的低沉的矿工小调声，以及上下洞声、土法洗选声，工具的锤击声，此起彼伏，显示了矿区的一派兴旺景象。

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八年的大锡生产数字（苏汝江《个旧锡矿业调查》）也可看出矿业的发展。

年	私矿产锡	锡务公司产锡
一九三一年	5632.5吨	829.5吨
一九三二年	6744吨	714.6吨

一九三三年	7431吨	754.5吨
一九三四年	6946.5吨	558吨
一九三五年	7528.5吨	680吨
一九三六年	9910.8吨	653.2吨
一九三七年	8916.4吨	735.2吨
一九三八年	10377吨	345.6吨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对日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祖国大好河山惨遭蹂躏，位于大后方的个旧，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后也遭到了日机的狂轰烂炸，加上越南、缅甸先后被日军占领，铁路桥梁被破坏，个旧大锡外销通路被截断。生产出来的锡没有人要，这就直接影响了厂尖的生存和发展，厂情开始崩溃，到四二年日趋严重，许多厂商息业散伙。四三年还未停业的厂商，也由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原来个旧生产每百老斤大锡可买米三石，计1020斤。这时只能买一石米，340斤，买砂的人，以锡为本位，值得一百老斤锡的砂，只给八十斤、九十斤，因怕钞票贬值，又以米折算，每百老斤大锡又只给七斗、八斗，层层加码克扣，而卖给炉号的砂款（锡款），又往往收不到现款，有点款又采取摊成分的办法（即以每次卖锡的款，按人数、砂款数字分摊），有的说，在个旧等卖砂的款，摊得少的只够在个旧吃账。不要说把卖砂的钱用来买米、买煤石（买矿用物资继续维持生产）。

与此同时，日机对个旧的狂轰滥炸，给锡城人民带来了更大灾难。据肖茂榕同志当时向在昆的俊发昌老板卢俊卿汇报的统计先后轰炸了二十三次。其中又以一九四〇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过冬日最惨。那天下午人们以为日机不会再来了，纷纷由防空洞。山上疏散回来过节，谁知日机突然飞来，投弹轰炸，米店街被烧，江川巷口（今北京饭店一带）以及车站街遭受了极大的损失，群众死伤无数。当时驻扎在个旧卡房、斗姆阁、乍甸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对个旧的防卫保护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警报方法是先由锡务公司炼厂拉大烟筒，后改由县政府放土炮，再后又改在老阳山上挂灯笼为号。以后个旧县政府向云南省政府要得高射机枪两挺安于老阴山和老阳山头上，但日机飞来时机枪不敢射击，而在解除警报、日机走后才象征性地放上几枪。坐商和居民们，随着厂情的崩溃，走的走了，留下的每天很早吃过饭就忙着疏散，要开门营业也只是早早晚晚。但是在梨园（现在的新冠选厂大门附近）形成了一个小市场，每天有两三百人汇聚在那里，做买卖、卖菜、卖柴卖草和出售少量农副产品的，也有小商贩在那里卖米线和其它吃食，遇有日机轰炸就散光了，这说明了市场的萧条。个旧土法扯炉的（炼锡），据统计先后有七十一座，其中有二十座一年到头都炼。到1940年时，就只有刘显光、吕秀秋、杨兴斋、黄美之等几家扯着三两座炉了。而且还时扯时停，摆盆收砂的也仅有四、五家，都是平时收得点，积攒点，扯上几天。收买大锡的也大大减少，原来买锡的湖大锡商（湖南）武万升家，广东的苏汗泉家，鸿兴号以及王维义等停止购锡，大锡堆满了锡库。仅有的几家，大都是商业上，有钱的人家收点。如邹湘家（曾做过香港生意）、李俊臣家等。由于厂情崩溃，个旧县城人口大量减少，到了晚上，绿春花塘子边（现在的五一路人民公园门口）、天君阁（现在的市百货大楼）、上下河沟、大坟坝

（现在的州政府所在地）等地成了豺狗出没之处。至于现在的三角地、宝华门、通宝门外，豺狗活动更是猖獗。老阳山脚（现在的永盛街）晚上也可听到豺狗的叫声。

据李八一同志回忆说：“从厂情崩溃前后，至解放后全行业公私合营，我都在龙树坡脚（在老湾子街后边）干。厂情兴旺时，在龙树坡脚的李恒洞里干着六家，有百十人；在另外的洞里，朱朝文干着二十多人，杨朝亮三家干着二十三人，樱桃树脚两家干着二十人，小铺子一家干着三十至四十人；在我的伙房脚下边一个姓向的干着三、四十人，马亦眉干着六、七十人；马亦眉伙房下边有李放山等三家干着二十四人，李朱三、何德两家干着十六、七人；我和我兄弟家干着十七、八人。在约半平方公里左右的地面上互相看得见，叫得应干着的有二十二家，约三百三十五人。崩溃时，只有我和我兄弟家干着五人，樱桃树脚那家有一人守伙房种菜过日子。我和我兄弟干的是草皮尖，也是收点马路坭整整卖卖而已。我了解的梅衣冲，有七间大伙房，八家人完全是洞尖，干得大的有曹二文、杨贵文、许朝富几家，每家有四、五十人，整个梅衣冲有三百多人。厂情崩溃时，只有曹二文等两家还有六个人，其余的都走光了”。

潘富国同志回忆说：厂情崩溃前，花扎口是很兴旺的，挖坭的很多，大概有好几千人，单财神洞就不下五百人，后只有王朝栋和绰号二老段等两家干着五、六十人了。红发洞不下四百人，尔后也没有人干了。联发洞原有六、七百人，崩溃后，记得只有张怀仁家还在挖坭，干着五、六十人，其他还有几家小的，最多也只得一百多人至二百人，我是依附张怀仁挖坭而存在的。整个花扎口只有约三百人了。四五年

抗日胜利后，矿区伙房断垣残壁，茅蒿丛生。

再以农村为例，团山的张继禹同志回忆说：团山整个村是干矿的多，干月活（当工人）的一个都没有。大的有上百人两百人的，中等的十几人到几十人，小的是三、两个人，七、八个人的老表兄弟尖。三二年时才十二岁，我印象最深的当时团山在家的男中青年只有六人，其他男的都是老人和小孩，男人都到矿区谋生去了。一九三七年是团山转矿山的黄金时代，团山的张国芳在卡房的鸡心脑干着有一百四十人到一百五十人。张广智干着有三、四十人，有昌号的张有武（我大伯家）在老厂的白牛洞、长发洞干着二百多人。张端图在瓦房冲的弹神洞、保保湾两处干着二百人左右。张太平既干着洞尖又干着买荒尖，在太平洞（原弹神洞）、滥泥湾干着七、八十人。张俊臣在壕子庙干着六、七十人。干着十人以上、二十人三十人的有张有先、张玉田、张兆堂、张来祥、张贵元、张贵瑾、张来元、张玉彩、张有信、张贵应等十一家，三两人、十人以下的有四、五十家。崩溃时，全村六、七十户干着的大中小尖子，都停办了。团山一下子回去了二百多人。从团山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厂情崩溃的情景。

由于厂情崩溃，大锡生产数字一年比一年减少，据《云锡记实》一书之记载，一九四一年大锡生产为5094吨，一九四二年为4641吨，一九四三年为3096吨，一九四四年为1613吨，一九四五年只为502吨，平均每天生产只1.3吨（这个数字是否包括锡务公司不太清楚）。一九四六年后厂情逐渐恢复，大锡生产达到1148吨，但到解放前夕的一九四九年大锡生产也只达到1156吨。

厂情崩溃及其带来的众多人失业后的困难和悲惨是难以想象和形容的。崩溃初、中期还有人拆伙房后将椽壳子、床楼板三文不值二文变卖后回家乡的，继后连这些东西也没有人要，只好关了门丢弃笨重工具拉着牲口回家乡；矿工回家更不同，有的坐小火车，有的三三两两走路，更多的是讨着饭回家。个旧矿山的人，以石屏、建水两地的人最多，其次省内外的人均有，外县人中又以宣威人多，玉溪人种菜的多，省外的经营商业的多。这些回乡的人，以石屏、建水人来说，命运是十分悲惨的。大家说：回石屏建水的人（多数指那些厂老板），都是卖古董、变卖家当过日子，人称建水马坊街卖古董的人比赶街的人还多。抗战几年垮了的占绝大多数。有的跑西头（指的元江和边五县）做生意，也是挑古董、瓷器、盐巴等去卖，换出大烟来卖。为讨生活，被土匪抢的、杀了的不少，特别是回来后，发疟疾死亡的人也多。在石屏坝心，四三年十月左右，一个月内因走江外死于疟疾的就有十六、七人。张继禹同志说：听他父亲（医生）说，当时建水绍武人走西头做生意，因瘴气无法医治死了一百二十多人，马家营死了一百零几人。团山一个寨子走西头的有七、八十人，经过医治后死于瘴气的七、八人。总之，在抗日战争时期，群众生活困难，处于饥寒交迫之中。

日本侵略者轰炸个旧的罪行

个旧三中 苏学文

个旧素以产锡闻名于世，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当然成为日本侵略者轰炸的目标之一。从1938年11月开始到1941年1月，日机共轰炸个旧26次，给个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38年11月26日中午，日本轰炸机六架，侵入个旧市区，向锡业公司俯冲投弹数枚，炸飞了数堆矿砂，炸死两人。日机之所以肆无忌惮的低空投弹，在地面上可以看见飞机里的驾驶员，是个旧没有防空设备的原因。经过这次轰炸，人们大半向石屏、建水一带逃难，无法疏散的人民每天只得跑警报。当时的防空讯号是，在老阳山上挂上红灯，挂一盏红灯为空袭警报。挂两盏红灯为紧急警报。由于个旧没有防空武器，敌机对个旧的轰炸更加频繁了。

个旧被轰炸最惨的一次是1938年12月22日，那天是旧历冬至节，按照习俗家家都要吃汤圆。本来早晨就发警报了（老阳山上已挂一盏红灯），大家都不在意，认为这是司空见惯的了，还忙着过节。接着就发紧急警报，老阳山上已挂起了双红灯，当时所发的紧急警报是说敌机已进入云南境内，并已向个旧方向飞来。所以人们惊慌了，才急急忙忙地向郊外疏散，可是一直都没有消息，此时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了，警报尚未解除，有的认为这个时候了，敌机不会来了。所以胆大的都回家升火做饭准备过节。我们没有回家的，在

老阳山上徘徊，下午四点半钟左右，忽然听到敌机的声音。在阳光的映照下，只见鄱阳方向的高空飞来灰白色的敌机群（据说是一个大队），发出隆隆的响声。这次敌机是高空投弹，只见无数亮晶晶的大小炸弹投向个旧市区，发出一声声巨响，霎时黄灰弥漫整个市空。黄灰过后，紧接着就是一堵堵黑烟夹着火焰冲向空中，整个市区顿成一片火海。这次敌机所投的炸弹有燃烧弹和爆炸弹两种，日本侵略者的意图是要把个旧烧成灰烬，以达到它破坏个旧大锡生产的目的。所以它从车站大街起就投弹，一直经正街转向云庙旁边的米店街，投下很多大大小小的炸弹，其中以燃烧弹最多，也夹杂一些爆炸弹。烧的最惨的是，现在联合医院对面的一排铺面（二层或三层的木结构房屋）。被烧的地段，由抬锡巷口起，到现锡城公社后门的斜对门止。米店街也是烧得最惨的一处，都是木结构铺面，所以一间都没有剩了，当时烧死了一人。这时，受害者泣不成声，同胞既痛恨日本帝国的侵略罪行，又愤恨国民党政府的无能。

轰炸过后，从米店街到火车站大街，都是断垣残壁，瓦砾遍地，那种惨状真是目不忍睹。到车站大街尽头，现在的人民小学，以前是一片菜地，被投一个重磅炸弹，弹坑有两公尺深，三公尺宽，旁边有一具男尸，从头到脚都没有伤痕。据分析是被震死的。

经过这次轰炸，个旧的人口减少了一半，上层人物和中产阶级都向建水、石屏、通海等地疏散，去躲灾逃难，剩下的多半是下等阶层，人民的生活极端困苦。繁荣的锡都一下子变成了荒凉的废墟。

日本帝国主义几次轰炸市区以后，又把目标转向矿山，

旨在破坏大锡生产。1939年以后，日本飞机几次轰炸矿山。有一次，敌机在秧草塘投了一个重磅炸弹，敌机这次仍是低空投弹，当它的机头还没有拉起来的时候，就被炸弹冲上去的破片和气流把这架敌机轰下来了。人们闻讯后，都前往观看。大家奔走相告：敌机被我们打下来了！这说明当时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痛恨。这架敌机的残骸，还拉到大坎坝（现在的州政府）展览了几个月。

1938年到1941年日机共轰炸26次，给个旧带来的损失，不是用经济可以计算的。现在上河沟东兴泰的墙上，还留有敌机当时用机枪射的痕迹。这是日机轰炸个旧的铁证。当时70%的人民都迁移或疏散到外县去，个旧城区只有几千人。市场萧条，百业凋敝，商人无法经商，谋生不易，矿山的生产，绝大部分停止了，伙房（矿工住所）、溜口（洗矿地方）都长青草，开矿老板纷纷遣散工人，可是连遣散费都发不出来，只好每个矿工发给两升米就作为遣散费。被遣散的矿工能回的都回原籍去了，没有去的都是残废者：有的眼睛瞎了，有的脚跛了，就这样流落个旧市区，流为乞丐，每逢庙会，数以百计的乞丐，从宝华门起，跪卧道路两旁，直到宝华寺门口，向过路的行人乞讨，那种惨状真是目不忍睹。

此时的大锡生产停顿了，多数炉商的炉号倒闭了，个旧呈现出一片荒凉凄楚的惨象。街上冷冷清清，行人稀少，太阳一落，就没有人敢出门。为什么呢？因为下晚，老阳山上的豺狗就到永胜街来吃人了。夜间，山上狼群的嚎叫声，使人不寒而慄。当时的个旧人民就是这样挣扎在死亡线上，这就是日本侵略者轰炸个旧的罪行。

日机轰炸个旧对锡业生产的影响

云南锡业公司工会 牛俊秋

个旧锡矿的开采历史悠久。民国十四年（1925）以后，个旧大锡的总产量，逐年均有所增加。特别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以后之四年增加最速，如二十七年（1938）竟超过一万吨，为前所未有。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后，特别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派遣大批飞机轮番轰炸个旧市区和厂矿后，对个旧的矿业生产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仅一九四〇年十月的三十天中，就轰炸动力厂四次，投弹四十余枚，十至十二月，轰炸老厂矿区的飞机达二十六架次，投弹二十八枚（个旧锡矿史68页）。十二月份，又同时轰炸个旧市区。个旧选厂、炼厂、新厂（今马拉格）、机厂都遭到无数次的狂轰滥炸。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使个旧锡业的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机器被炸毁，厂房被炸倒塌，一些商号或厂尖被迫停产。据不完全统计（即1940年轰炸以后的统计），矿石损失三万余斤，停产损失折合法币三亿元左右，许多工厂因轰炸而拆迁，增加防空设施，机器疏散损失费用总计三亿七千多万元。无数的矿工和居民无家可归，有的惨死在狂轰滥炸或机关枪扫射之下，据不完全统计，炸死炸伤矿工九十余人，损失各类财物小计九千多万元。

由于日机的轰炸，市区的米店街、大桥、江川巷、老衙

门，下绿春花和车站大街到处是残垣断壁和数不清的弹坑。由于日机的轰炸，特别是一九四〇年七月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北部，一九四一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截断了个旧大锡外销线，给个旧锡业生产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原来昼夜炉火熊熊繁荣兴旺的个旧逐渐衰败下来。许多地方蒿枝成林，豺狼成群。每到夜晚，特别是更深入静，夜风呼号之际，胆子大的独豺狗不时窜到天君阁（今百货大楼）一带叨小孩，吓得一些居民惶恐不安，每到黄昏以后就关门闭户，街景十分萧条。个旧锡业每况愈下，生产一蹶不振。以炼锡公司（云锡冶炼厂的前身）为例：一九三五年产锡1,154吨，一九三六年产锡1,745吨，比三五年多产了591吨，上升51.2%。一九三七年产锡1,775吨，又比三六年多产30吨，上升0.7%。一九三八年产锡2,445吨，比三七年多产670吨，又上升37.7%。这些统计数字充分表明了个旧锡业生产蒸蒸日上，但到了一九四二年，炼锡厂（一九四〇年炼锡公司同云南锡业公司合并）就只产锡934吨，比三八年少产1,511吨，下降了2.62倍。到一九四三年又只产924.5吨，比四一年少产9.5吨，下降10.2%（见云南锡矿阅览表，个旧锡矿历史资料汇编）。这些统计数字进一步阐明了日机轰炸及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太平洋战争，侵占东南亚地区后，对个旧大锡生产的严重影响和破坏。

抗日战争时期的个旧《曙光日报》

舒 新

日本军阀发动的侵华战争，唤醒和激励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和爱国热忱。在屠刀面前，人民怒吼了，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了。

除了出卖民族利益以及假抗日真反人民的败类，全国人民都以各种方式为抗战而尽力。

一九三九年底，在个旧经过改组、整顿而于一九四〇年三月创刊的《曙光日报》，就是一张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团结各阶层人民积极抗战的报纸。她既是共产党同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精神产品，又是人民的喉舌。

(一)

一九三九年夏，个旧县的爱国士绅想把当地国民党县党部所办的“官报”接过来，作为宣传抗战，及为受官僚资本排斥的民族工商业而呼吁的报纸。他们通过苏莘农先生来同地下党员吴玉夫同志协商。吴玉夫向中共云南省工委负责同志汇报了个旧士绅愿意出资办报，以宣传抗战的愿望。省工委赞同爱国士绅的抗日热忱，并决定同他们合作，在云南省工人阶级人数最多的锡矿工业区办报，用以宣传党在抗日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作为恢复党在个旧地下工作的一个据点。在省工委工作的李浩然、李剑秋两同志曾几次同苏莘

农先生晤谈，经过协商，达成了双方认可的协议：由苏莘农先生出面争取接收县党部的报纸，筹措资金，准备厂房，购置设备；省工委负责组织编辑班子，配备工作人员。

(二)

筹备工作积极进行着。首先由苏莘农出面，邀约个旧工商界名流、地方头面人物组成《曙光日报》董事会，由苏莘农任董事长兼报社社长，并在董事会上落实办报资金，决定将云庙部分房屋借给报社作办公室和职工宿舍，将土主庙拨作报社社址。另外，经吴玉夫同志的介绍，由苏莘农，赵国徽代表报社与昆明华山南路美丽印书馆经理王志钧签订在个旧设厂印报的合同，印刷厂由王志钧担任经理。该厂同时对外经营，用所得收益来补贴办报。

省工委先派张天虚去个旧调查研究，了解个旧、蒙自、开远、建水、石屏等地的情况，并同苏莘农商谈筹备工作的细节。

省工委还决定由昆明“省文化支部”派党员到个旧支持办报。在昆明成立“曙光日报昆明办事处”，由李群杰同志担任主任。派到个旧报社工作的同志是：报社总编辑张天虚，主持笔政，报社经理赵国徽，还选派了以党员为主，并有革命知识分子参加的编辑班子及工作人员。黄季方、王时凤、张培熙、曹世文、高扬、周象之、何宏年、李乔等同志。吴玉夫同志协助办报，不参加具体工作。

一九四〇年一月三日报社工作人员，除原定的总编辑张天虚因肺病未愈，加之政治上有所暴露而不能到职外，全部到个旧。苏莘农先生于一月底以社长身份宣布报社机构组织